

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拿起锤子能做工 拿起锄头能种田
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 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

让更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只有让更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

湖南省长沙市邮电局话务员 刘秀英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从心里拥护毛主席的号召。学政治,就是学毛泽东思想。这里谈谈我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

我家四代都是贫农。我的童年生活很苦,曾经讨过饭,给资本家当过丫头。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了出来。在我家几代人中,我第一个上了学校,并且当上了人民话务员。

参加工作以后,我就埋头工作。炊事员病了,我帮着做饭;茶水没有了,我帮着烧水;别人没干完的活,我帮着干。有些人却冷言冷语地讽刺我,说我是叫花子出身啦!说我干不了话务员啦!我那时分不清是非,就觉得自己“叫花子”出身不光彩。真是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就顶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

一九六三年底,邮电局党委号召全体职工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工人说:“一天不吃饭肚子饿,一天不学毛主席著作思想饿。”我对肚子饿,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思想也会饿呢?当时我不明白。通过学习,我想通了,雷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也必须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真的,我一读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分析》这篇文章,就被毛主席的话紧紧地吸引住了。我含着眼泪看了一遍又一遍,边看边想。我的家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农村无产阶级,后来因为丧失劳动力,成了游民无产者,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我天天读这篇文章,读了三个多月。当我开始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时候,心里立刻亮堂了。从此我就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管一天怎样疲劳,也要坚持学,一天不学,心情就不舒畅。思想饿的滋味,我尝到了。

我从毛主席的教导中懂得:革命是千百万人的事情。因此,只有让更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什么是最重要呢?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工作和占领一切阵地。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觉得自己肩上责任加重了。我首先想到了我身边话务员同志都是青年人,热情很高,但还需要提高政治觉悟,掌握毛泽东思想。我就和他们商量,成立自学小组,抓紧一切时间读毛主席的书。

对社会上的事情,我们同样用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和处理。一次,我在路上看到一家小茶馆里许多人在嘻笑吵闹,还有唱旧戏的,听了很不是味。我便向自学小组的青年一起到茶馆里去给大家谈毛主席语录,或用文艺形式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受到大家的欢迎。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我碰到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各种刁难,他们说我们“多管闲事”,想用增加我的业务的办法来要我“少管闲事”。我说:为了无产阶级事业,不让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万万办不到!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密切结合斗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还拿起笔杆,写了许多篇声讨、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文章。我过去没有在人大会上表演过节目,可是今年庆祝“七一”工农兵文艺晚会上,我登台朗诵了自己写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诗歌。我下定决心:要帮助更多的人学政治,掌握毛泽东思想,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

十几年来,在同工人结合,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脑力劳动者只有永远不脱离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才可能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新人。

知识分子永远不能脱离劳动

我深切地体会到:脑力劳动者只有永远不脱离体力劳动,永远同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才可能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新人。

鞍山电业局工程师 郑代雨

一块装车,一块搬运工具和烧水做饭,我熟悉了工人,工人也熟悉了我,能够爱工人之所爱,恨工人之所恨,同工人逐步地有了共同的语言,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同时,因为在劳动中常常遇到许多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积累了一条经验,解决了许多问题,就积累了许多经验。经验多了,遇到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勇气和办法,象过去那样遇到生产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状况,

毛主席最近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将坚决、最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

毛主席号召我们工人要学政治,学文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体会得更深刻、更亲切了。

在旧社会,我们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失去了读书的权利;大部分建筑工人没有文化。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老工人十分气愤,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就是提不起笔杆子来批驳。

工农结合育新人

实践证明,亦工亦农是一个好制度。这样做,工农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增进感情,成为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

四川省温江专区氮肥厂工人 程光荣

今年我们工厂附近的华严公社胜利大队挂钩,实行一部分工人轮流下乡当农民,一部分农民轮流进厂当工人的制度。

第一批下乡当农民的工人,到了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农民办了技术夜校,首先跟农民一块学习毛主席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到农村以后,就和社员们一块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经常注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第二生产队队长在蒯蒯时,采用高工分的办法来提高蒯蒯质量。我们就跟社员们一道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讨论了“究竟是革命种田还是为工分种田”的问题。社员们批评了队长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做法,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大家提出了要学习白求恩,要为革命而种田。经过这场讨论,政治挂了帅,蒯蒯又快又好。

我们厂里的职工,一块下到第十生产队共有四个人。下乡以后不久曾经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有天早上三点

我们工人一定要做旧世界的批判者

我们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要当好主人,牢牢掌握印把子,就一定要作旧世界的批判者。要作旧世界的批判者,就一定要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最锐利的武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卢珊
天津建筑构件一厂钢筋队长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情况可大不一样了。因为这几年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很多工人掌握了文化,可以挥笔上阵,来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了。

我们钢筋队的三十五个人,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写了四十多篇文章,举行了九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我们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在一次讲用会上,老工人董文义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先立后破”的谬论时说:“先立后破,完全是胡说,这

是阶级敌人胡弄我们的鬼花招,不先破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先破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伟大的新中国能够立得起

来吗?”他的话一针见血,真是批判得有力!我们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要当好主人,牢牢掌握印把子,就一定要作旧世界的批判者。要作旧世界的批判者,就一定要掌握文化,掌握最锐利的武器毛泽东思想。只有批判了旧世界,才能保卫和建设新世界。

我们钢筋队的同志们,从学习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工人一定要象毛主席指示我们那样,拿起锤子能建设社会主义,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拿起枪杆子能保卫社会主义。

我们是民也是兵

只要一声令下,个个都能拿起枪杆子打敌人。我们民兵连全体同志平时搞生产,需要的时候,个个都能拿起枪杆子打敌人。

上海电车三场保修车间民兵连长 张关海

我们民兵连全体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以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行这一伟大指示,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保证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的根本保证。我们民兵连,也是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根本保证。我们是民,也是兵。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面积极搞好生产,一面努力学习政治和军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民兵连全体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以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行这一伟大指示,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保证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的根本保证。我们民兵连,也是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根本保证。我们是民,也是兵。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面积极搞好生产,一面努力学习政治和军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有了很大的改变。无数的事实告诉我,劳动现场是最广阔的知识天地,工人是最高的老师。真正的技术工人是工人,而不是那些“专家”、“权威”。工人阶级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最富有生产斗争经验的,书本上没有的经验,工人有;理论上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工人能解决。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家,必须在劳动中同工人结合,向工人学习。



浙江海宁县水泥制品厂亦工亦农的工人在浇铸排灌用的水泥渡槽管。安援农业。

新华社记者摄

七亿人民决心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据新华社五日讯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伟大号召传到各地，人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话说出了全国七亿人民的希望，毛主席的话里，蕴藏着全国人民的幸福。他们表示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做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革命的航船一直驶向共产主义。

各地的人们在讨论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时纷纷指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毛主席在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河南省兰考县城关公社韩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素兰兴奋地向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宣读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她说：“我们贫农下中农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坚决跟随毛主席闹一辈子革命。我们一定要象解放军那样，把农村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大大提高农民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为实现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全国纺织工业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西北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长小组长吴桂贤说：我们小组通过十多年的革命实践，感到要胜利建设社会主义，胜利建成共产主义，就要先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育共产主义的新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自己锻炼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直扛到共产主义。

沈阳市各界八千多人四日举行了坚决把各行各业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誓师大会。中共沈阳市委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对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要立即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学习活动，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大规模的贯彻执行的活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对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特别感到亲切。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人民，连日来纷纷举行座谈会。老红军战士、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朱轩兴奋地说，当年毛主席领导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时候，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

锄，一面打仗，一面生产，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文化。现在毛主席又号召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这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我们的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要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把井冈山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革命圣地延安的人民得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以后，奔走相告，兴奋异常。枣园大队老赤卫队员陈有马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创造性的伟大发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边打仗，边训练，边生产，既学军事，又学政治，又学文化。军民亲如一家人，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我们要更听毛主席的话，继续发扬这一光荣革命传统，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

许多人以自身的经历证明，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办事，就会无往而不胜。许多人表示要立即用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正在黄县参加山东省省委、县长会议的部分农业劳动模范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满怀激情地一致表示热烈拥护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崂山县城阳公社小寨子大队队长张以爱说：在办人民公社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提倡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公社化以来，我们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以农为主，并办起了十几个小工厂和副业项目，还成立了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建立了民兵连，全大队社员都参加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我们深刻体会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我国人民就能真正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曾经在延安豹子湾参加过大生产运动的现任湖南吉首军分区副司令员罗斌虎，回忆了当年大生产运动的经过。他说，今天，我们要把我国建设得非常富强，要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主要的一条，是要使全国人民都掌握毛泽东思想，把各行各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浙江宁波市江东中学教师高影霞说，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是我们的行动纲领。她说，江东中学就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几年来，我们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这个教育制度。她说，我们一定要遵

照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办好我们的半工半读学校，并且以解放军为榜样，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牧区“大寨”——乌审召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公社党委书记朝格朗说：“我们牧民以牧业为主，今后也要搞农副业生产。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为我们乌审召公社的牧民们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中共湖南省岳阳

县委机关从一九六四年大学解放军以来，在实现机关革命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次他们表示要继续坚持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从思想上、领导方法上、工作作风上、组织制度上，进一步实现革命化，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底革命派。县委机关一百三十多名干部，除留二十五人主持机关日常工作外，其余全部带着毛主席著作到农村去蹲点搞样板，既当干部，又当农民，积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动三大革命运动，决心把全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刘主席接见赞比亚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五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和由他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林海云、南汉宸、雷任民、侯野烽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八月五日，刘少奇主席接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和由他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图为接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啊，您是全世界人民心中不落的太阳！

——记四大洲各国科学家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来自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们，许多人从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天开始，便提出了一个最热烈最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现在，这个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这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晚间十点多钟，毛主席接见了参加北京物理讨论会的各国科学家们。

欢乐的最高潮 幸福的最高潮

接见大厅里，灯光齐明。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缓缓地朝着大家走来，不时抬起手臂向各国朋友们挥手致意。

见到了久已渴望见到的伟大领袖，见到了举世仰慕的伟大革命家，人们激动得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们目不转睛，凝视着毛主席高大的身躯和他那慈祥的面容，要把这时见到的一切都永远永远地印在脑海里。有的科学家事后告诉中国朋友说，当时，他们一颗激动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了。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顷刻之间，整个大厅沸腾起来了。肤色不同、国籍不同的各国朋友们，操着各种语言，怀着最诚挚的感情，从内心里发出了同一个欢呼声。各国科学家们一面欢呼，一面热烈鼓掌，有些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

毛主席同各国科学家们合影后离开大厅的时候，各国科学家们又涌向毛主席，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愿伟大领袖万寿无疆！

毛主席离开了，各国朋友们依然留在大厅里，很久很久地回忆着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情景。

在这里，各国科学家们放声欢笑，兴奋地互相握手庆贺。

在这里，许多人抚摸着毛主席同大家合影时刚刚坐过的椅子，追忆那最幸福的时刻。许多人找到毛主席同他们握手时自己站过的那块地方，争相摄影留念。

夜已渐深，大家还久久地不愿离去。

越千山万水来到北京的伊拉克科学家易卜拉欣·纳西尔，这时是激动得如此地难以抑制。他在宽敞的大厅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并且说：“我今天不回去了，我要留在这里！”

来自我们友好邻邦的柬埔寨科学家吉查，在毛主席同各国科学家合影时，坐得离毛主席最近，他因此而感到“无限幸福”和“无上光荣”。他说：我们为有中国这样伟大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骄傲。

经过同伟大反日派作了种种斗争，克服了重重障碍，然后才来到北京的日本科学家们，也向中国朋友倾吐了自己的心情。日本科学家代表团团长野上茂吉

郎说：“接见的那天，我能够坐在毛泽东主席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中国人民卓越的领袖近旁，这是我一生中不能忘记的宝贵时刻。”

来自非洲的苏丹科学家阿明说得好：今天晚上，是北京物理讨论会的最高潮。

这是欢乐的最高潮！这是幸福的最高潮！有些人是在无限兴奋和激动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伊拉克的另一位科学家吉塔，刚到中国来时曾经说过：“这次要是见不到毛主席，我就不回去了！”现在，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极了！他事后告诉别人，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秒钟也平静不下来，一直兴奋得满身出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他满怀无限深情，对中国朋友说：“毛主席不仅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你们和中国人民一起前进，也和我们一起前进。你们应当为他感到自豪！他是个最伟大的人啊！”

在乘车回宾馆的路上，在回到宾馆以后的宁静的深夜里，许多人还找中国朋友谈论着，相互间谈论着，有些人在无限兴奋和激动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伊拉克的另一位科学家吉塔，刚到中国来时曾经说过：“这次要是见不到毛主席，我就不回去了！”现在，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极了！他事后告诉别人，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秒钟也平静不下来，一直兴奋得满身出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他满怀无限深情，对中国朋友说：“毛主席不仅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你们和中国人民一起前进，也和我们一起前进。你们应当为他感到自豪！他是个最伟大的人啊！”

塞拉勒窝内科学家贾洛，在毛主席同他握手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用刚学会的中国话喊着：“毛泽东万岁！”

来自厄瓜多尔的科学家巴拉甘·罗梅罗，在毛主席接见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乘车回宾馆的路上，他在车上还流着泪。一路上，他和厄瓜多尔的一位科学家、六十多岁的古斯塔夫·蒙卡约，再三要求中国译员教他们用中国话喊“毛主席万岁”，一遍又一遍认真地学着。回到宾馆以后，古斯塔夫·蒙卡约逢人便说：“毛主席和我握了手啦，我真太幸福了，太光荣了！”

“我真太幸福了，太光荣了！”这是来自四大洲的各国朋友们共同的心声。他们表示要过这最美好、最幸福的记忆带回国去，传达给他们的亲人、朋友和他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也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光荣。

日本科学家小川修三、横尾由松和锡兰科学家坎南加拉，在毛主席接见以后，都兴冲冲地跑到中国译员们紧紧地握手，说：这是毛主席同我们握过的手，你们也来分享一分幸福吧！坎南加拉还说：“没有毛泽东主席这位伟大的人，中国不可能有今天！”阿根廷的科学家们向别人表示他们的兴奋心情时说，因为毛主席同他们握了手，他们真想再回去再也不洗手了。他们说：有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今天中国的伟大成就。

毛主席这样健康是世界人民的幸福

在毛主席接见的前几天，当各国科学家们得悉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喜讯时，他们便争相传告，纷纷找来报纸，喜看毛主席的焕发神采，从中得到了无限的鼓舞。今天，当他们亲眼见到毛主席是那样健康的时候，他们又怎能不欢乐，怎能不感到无限幸福呢！来自四大洲的科学家们说：毛主席这样健康，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印度尼西亚科学家苏哈里约，缅甸科学家吴叫敏，还有日本、柬埔寨、刚果（布）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在毛主席接见刚结束时，便纷纷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力充沛，身体好极了！厄瓜多尔科学家罗梅罗感动得握住中国朋友的双手，热泪盈眶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毛主席非常非常地健康啊！”几内亚科学家赛杜说：“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接见时，毛主席那魁梧的身板刚一出现，我们的心便无限地激动起来，整个大厅都沸腾起来了！”

来自乌拉圭的科学家格龙波内，来自乌干达的科学家穆拉尼，来自摩洛哥的科学家瓦扎尼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亲眼见到毛主席以后，都不相信毛主席今年已有七十多岁，说是顶多象五十岁的人。智利科学家马丁诺亚更是无限赞叹地说：毛主席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千辛万苦，今天还要考虑天下大事，他老人家仍然这样健康，真是了不起啊！

哥伦比亚科学家甘巴夫人也一再指出，毛主席如此健康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她还对中国朋友们表示，她不仅要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转告她所认识的每一位热爱毛主席的人，而且要写成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在西方世界散布的谎言。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

这次前来参加北京物理讨论会的四大洲各国科学家，有些人在来北京之前便读过毛主席的书，从中得到了启发和力量。在这次来到北京之后，有的人一下飞机便要求中国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放上一套《毛泽东选集》，有的人自己购买了《毛泽东选集》，有的人利用十多天的早晚休息时间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的人在会议上和在参观中一再颂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颂扬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各国科学家，更被他们看作是鼓舞自己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毛主席接见的第二天晚上，哥伦比亚科学家甘巴

随身携带着毛主席的《实践论》，接见以后，他又拿出来阅读。甘巴夫人说，毛主席指导革命的理论，不仅对本世纪，而且将千百万载地起到它的伟大作用。塞拉勒窝内科学家贾洛谈到，今后再阅读毛主席著作时，就会想起毛主席这次接见时的情景，从而感到倍加亲切，增添无穷的力量。有的科学家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宣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宣传毛泽东所受。

来自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和智利的三位科学家，在毛主席接见以后热情地说过的一些话，也许可以代表四大洲科学家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

柬埔寨科学家塔路易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天才，历史上任何一天才都比不上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

阿尔及利亚科学家优素福说：“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是一个经历过长征的伟大劳动者和革命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得到七亿人民的完全信任和无限热爱，他的思想能为七亿人民所接受，并且在各个领域内得到应用和取得辉煌成绩，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永远留在记忆之中

智利科学家达尼洛·比利亚罗埃尔说：“现在全世界革命者都向往着毛主席，向往着中国共产，向往着伟大的中国人。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世界人民革命的光辉灯塔。如果全世界人民都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那么，毫无疑问，全世界革命将会大踏步前进。我对毛主席有着最高的信仰，这是因为毛主席无论在政治或军事等方面都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世界人民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是最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观点。全世界革命人民需要毛主席这样一个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次幸福的会见，将永远留在各国科学家的记忆之中。科学家们纷纷用最美好的语言，在笔记本上记述同毛主席会见的时刻：

“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一位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家说。

“这是我终身最大的荣幸！”缅甸科学家吴达莱说。

“这是最珍贵的时刻，是幸福的高峰！”摩洛哥科学家瓦扎尼说。

这些以各个不同国家的语言道出的激动心情，表达了四大洲各国科学家们的同一个声音，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呼声：“毛主席啊，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太阳！”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毛泽东

彻底清算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郑季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一直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文艺界所以被搞得黑浪翻滚,十几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就是因为这条黑线不断兴妖作怪。而这条黑线所以能够不断兴妖作怪,又是因为在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里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有一个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是谁?就是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他利用职权,把持着许多文艺部门,垄断了许多出版阵地,既可以调动组织力量,又可以制造文坛舆论。这样,他们的活动,就产生很大的影响,造成极大的危害。

有人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周扬不是多年来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吗?不是曾经组织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丁玲、陈企霞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吗?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黑线的总根子呢?其实,这统然是周扬及其同伙编造的神话,是一个大骗局。

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历次斗争,例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丁玲、陈企霞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等,都是由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而周扬则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或明或暗,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立论设障,煽风点火,积极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周扬是一个典型的阴险狡诈的伪君子 and 两面派。

他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拥护毛泽东思想,背地里诋毁毛泽东思想;大会上拥护毛泽东思想,小会上攻击毛泽东思想。

他惯于使用折中主义的语言,是一个作“假书”文章的专家。他的文章、讲话,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先来一段抽象的似乎正确的议论,紧接着便在“但是”后面大作反面文章。他论述问题的方法,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模棱两可,亦此亦彼,把一些本质上对立的观念弄得混乱不堪,从而混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颠倒了修正主义黑货。

他惯于看风转舵,如同螭蝎一样,随时改变其颜色。右派猖獗的时候,他就给他们煽风打气,一同向党进攻;而当反右派开始时,他就伪装左派,作报告,写文章,装演自己,贪天之功;当斗争深入发展,快要触及到他的时候,他就采取牺牲性车马、保存主师的办法来解围自己。

所以,对于周扬的认识,万不可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现在,这个混在党内几十年的文艺界黑线的头子,已经被揪出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周扬在近些年来所干的罪恶勾当。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唯一正确的指针,是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强大的革命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而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不仅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提倡文艺作品努力表现毛泽东思想,反而公然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一九四二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著作,光辉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文艺路线,解决了美学的根本问题。而周扬却狂妄地企图建立自己的一个美学体系。他在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大学作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报告,并计划要和他的同伙林默涵和邵荃麟等人,陆续进行讲演,鼓吹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来对毛主席的伟大学说相对抗。

周扬一贯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干涉”,是“包办”。他要我们同党外人士共同领导文艺,他在一九六一年中宣部召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员艺术干部座谈会上说:“你同党外人士合作,不是共同领导?……千万不要发展到党干,你通过党外的专家去领导,就是领导嘛。”

是总的领导,具体的部门是要共同领导吧!”他觉得党员艺术干部多了倒是个祸害,因此提出:“你们(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干部中非党人士太少,也是个缺点,是不是从上海调几个去到你那里担任副职,调剂调剂,我真是这样想。”一九六二年,他在长春话剧演员座谈会上挑拨说:“对我们每个同志来说,应该锻炼这么一种能力,就是能在好的领导下做好工作,也能在不好的领导下做好工作。……在特别不好的领导下做好工作,要锻炼这种本领。”这里,他所说的“不好的”领导,就是指着党委的领导说的。不久以后,他和辽宁文艺界谈话时又说:“艺术创作也同医生开刀一样,医生的责任是挑好医生,开刀开药都交给给他,由他负责。”他反对文艺创作上领导、作家和群众的结合,恶毒地要把这种“三结合”歪曲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他自己这样丑化了“三结合”之后,又对“三结合”加以嘲骂,他说:“作家那么容易做呀,还要作家干什么?那训练一大批秘书,都会写,你讲出来,我就会写,写了以后群众来补充生活,那还要作家干什么。作家还有什么可贵!”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扬煽动文艺工作者脱离和反对党的领导,是费尽心机的。

不仅如此。他还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发泄内心对各级党委的仇视情绪。他在一九六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几十年以后的人看我们党员要那么服从组织纪律,正象我们看岳飞那么服从皇帝一样,为什么几块金牌就把他调回去了,他们会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开会斗争那么辛苦,为什么那么胆小,怕什么‘边缘地带’。”他又煽动说:“同志们用‘边缘’二字,有深意存焉!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一跌入下,万劫不复。”显然,这是污蔑我们的党,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知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一切方针政策,都是制定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在我们国家,出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了国家的主人,个个扬眉吐气,胸怀坦荡。试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什么人怕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和修正主义深渊?只能是地富反坏右,只能是那些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两面派。至于文艺事业,它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周扬用尽心机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暴露的十分清楚吗?

二、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承认阶级存在,并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是马克思主义者最起码的条件。同样,承认文艺事业的党性原则,即承认文艺艺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并自觉地使文艺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艺术家的一个起码原则。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又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本来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周扬却说“人类的美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他就否定了“美”的阶级性。不仅如此,周扬还胡说我们现在的文学,是“全民文艺”。赫鲁晓夫抛出的是“全民党”、“全民国家”,周扬抛出的,是“全民文艺”,显然,周扬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头。

周扬搞资产阶级人性论,竭力抹煞文艺艺术的党性原则。他在一九六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在人性论的争论上,我们需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签主义。……标签主义是把什么都贴上一张阶级标签,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好像人就是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他这里所说的“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是虚晃的一枪,他实际攻击的是文艺事业的阶级性。这看看他在这个发言里的另一段话就可明白:“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是只给本阶级看的,它是给所有的阶级看的,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至于它引不起得来,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文艺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接着又说:“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这里,他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发生共鸣,要无产阶级欣赏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不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人性吗?他没有丝毫批判人性论,相反,正是狂热地宣扬了人性论,反对了阶级论。

周扬对“人道主义”的吹捧也是很卖劲的。就在上述在北京大学的那次讲演中,他说“我们的人道主义是最彻底的”,他经常把“人民性”挂在嘴上。这种所谓人民性,就是人道主义的别名。他在一九五六年全国剧三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戏曲里的人性是很丰富的,不要用狭隘的观点去看它,而认为统治者就没有人民性。统治者也有人民性的。如钟伯,包拯等人,他们是统治阶级,而且包拯的官很大,但他对人民好,人民对他寄托了很多理想,因此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表现人民愿望的东西。中国戏曲的好处,是它比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更有人民性。”周扬把无产阶级的文艺,说成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文艺,把封建统治者说成具有人民性,这就是公然地抹煞阶级矛盾,宣扬阶级调和论。

周扬散布的这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共同”的政治伦理,“共同”的人性,“共同”的情感,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的谬言,还散见于他的好多报告与讲话中。他宣称“人总是倾向正义,倾向公道”,凡是大家作家都要“要使他的作品为人类服务”,等等。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对人性论作了最彻底的批判,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个性,没有超阶级的个性。而周扬却在人大谈反对阶级之间的“共性”,大谈“为人类服务”,这不明明是对抗毛泽东思想吗!

三、为现代修正主义辩护,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点,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说得一清二楚,并在党中央接读发表的修正文章中继续得到阐明。而周扬,竟然在一九六〇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说:“修正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还不是主要的,……因为:一、我们反对了胡风,批判了右派,修正主义不容易抬头;二、中国的修正主义比外国差得多……;三、修正主义刚在露头,未得机会大发展,因为它刚露头就容易把它消灭,所以要想在现在批判修正主义还要临时培植修正主义啊!真正的修正主义还要有一套理论嘛!”这里周扬特别吹捧修正主义有一套所谓“理论”,并认为我们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还必须“临时培植修正主义”,这真是极其荒唐的奇谈怪论!周扬还竭尽心思地为苏联修正主义辩护。他在一九六三年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修正主义搞不讲人情,我们则对他唱对台戏,偏不讲人情,你讲人情,我偏不讲人情,你讲和平,我偏不讲和平,你讲劳动,我偏不讲劳动,对立起来。我们不要干这种傻事。”在这里,周扬故意制造混乱,混淆是非。修正主义什么时候真正地强调过“劳动”?我们在什么时候有过“偏不讲劳动”的事情?周扬维护修正主义,竟然落到这样一种地步!

更为严重的,在们已经连续发表了八篇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后的一九六四年五月,周扬在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还在叫嚷,对于反修问题“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要太急,因为它究竟不是现实问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修正主义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用修正主义思想来腐蚀干部和群众,实行和平演变,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之一。周扬说反修不是现实问题,就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要我们对“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置之警惕,就是我们听任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泛滥,以至于资本主义复辟。

周扬对修正主义是这样厚情深,但对所谓“教条主义”却是切齿痛恨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高喊着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他说:“我们今天的美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给文艺创作制定了许多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足。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起来,给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损害。”而在一九六二年关于《文学概论大纲》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假借性地说了一句“观点中要贯彻反修正主义”之后,接着就讲:“另一方面,虽然不一定公开提反教条主义,但实际要反,反它的取消艺术特点。”这里,周扬所反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周扬就是这样倒行逆施的!

四、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某些讲话中,有时也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装点,一种掩护。实际上,周扬正是以最集中的火力、最系统的理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

他以反“题材决定”论反对作家描写工农兵,反对表现社会主义。周扬说,重大的题材“不一定”是“政治上的重大事件”,而是“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和兴趣的题材,又是对大家有益的题材”;又说,“不要领导提倡什么就写什么”;又说,“现代题材还是从‘五四’算起”。这些主张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作家可以写工农兵,也可以写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帝王将相;可以写重大的政治斗争,也可以写身边琐事、风花雪月、儿女私情;可以写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写荒古趣闻、旧国遗事、外域风光。大家知道,题材问题关系到谁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人公的问题,关系到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题的问题。以工农兵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和以地主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作品,绝不可同日而语;以风雷激荡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为主题的作品和以个人身边琐事为主题的作品,绝不能等量齐观。把这些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给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开路,反对表现工农兵,反对歌颂社会主义,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周扬提出了一个“间接配合”论。他在一九五九年北京大学讲演的《文艺与政治》中说:“我们讲文艺服从政治的时候,要防止、克服、纠正另外一种简单化的方法,就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简单地理解为为每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每一个具体的政策作宣传。”他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直接配合与间接配合,都是为政治服务。”应该指出,政治并不抽象的东西。无产阶级的政治,一定要体现为具体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具体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文艺不给具体政策和具体政治运动作宣传,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周扬提倡“间接配合”论,就是要引导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为什么文艺不能给具体政策和政治运动作宣传呢?周扬假借了时代不同的说法。他在一九五六年全国剧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人民文化需要,与革命战争时期有所不同。在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要用戏剧去宣传鼓动,为了配合任务,就有《动员参军》、《送公粮》、《瓦解敌军》等节目,作为政治鼓动。现在我们处于和平建设的时代,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人民需要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情况就不同了。过去宣传鼓动的戏,在野外演,大家来看,看完了就上前线;现在则是在大剧场演戏,观众都要花钱买票,并且要排队买票,戏如果不好,他们就不来,所以我们必须有某些本领才行。因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剧目要好,要多样,要符合群众的需要。”他这里把《动员参军》之类的反映当时政治要求的戏和所谓“好戏”对立起来,又把戏的好坏归结到票房价值!与此相应,他又提出“四好电影”的主张,那就是:“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就是不要好政治、好思想。大家看,在周扬的心目中,在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倒不需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这样,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和“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活动,倒是不合乎时代要求了。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周扬以研究中外古典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为名,宣传“为艺术而艺术不一定是反动”的理论。这也是为了引导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此,周扬还提倡大搞滑稽影片。他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生活已经很紧张了,不要看戏的时候也搞得那么紧张……要搞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可以大搞滑稽影片,大搞滑稽电影。”一九六一年以后,出现了象《球迷》、《小李和小李和老李》等庸俗不堪的坏影片,就是周扬这个理论的结果。

和上述理论相适应,周扬又创造了一个“无害”文艺论。周扬把文艺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所谓无害,就是政治上没有害处,而在生活上还有点益处的。比如戏曲《游园惊梦》、山水画就属于这一类”。世界上真有这样政治上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第三种文艺吗?就从前所举的例子来看,《游园惊梦》难道不是宣传封建迷信、才子佳人的鬼戏吗?难道是“无害”的吗?周扬到底是谁代人的文艺的一个头目,他竟然把那时某些人们宣传的所谓第三种文艺的黑货给贩卖来了!

(下转第四版)

彻底清算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上接第三版)

五、煽动文艺工作者拒绝思想改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最根本的道路，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世界观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正无产阶级化，并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这条道路，毛主席早已指示得明明白白。但是，对于这样一条革命化的道路，周扬是反对的，仇视的。在他的报告和讲话中，不强调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认真提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偶而提及，也只是把深入生活当作搜集创作素材的手段。相反，周扬实际上是在反对作家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要求人们不要“经常把世界现挂在嘴上”，他认为“什么都是政治，什么都是世界现”，就是“把世界现庸俗化”。他主张“不表现时代、反革命也允许。”他号召“现代题材历史题材都可以写。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把握的题材。”他的这种主张，是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的翻版。

一九六二年，是我国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修正主义背信弃义而遭到暂时困难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周扬一伙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放出了大量的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毒箭。在这个会上，周扬煽动作家和党的方针政策对立，鼓吹了所谓“写真实”论，他说：“看法和党有距离，可以暂时不写，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是一段恶毒的反党黑话！革命的作家有时候会产生跟不上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但这和周扬所宣扬的绝不是一回事。周扬把党的方针政策 and “生活”、“真理”、“客观事物”对立起来，这就是说，他们那伙作家的看法，是符合生活实际、符合于真理的；而党的方针政策倒是错误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周扬所以这样主张，实际上是煽动作家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在这个会议上，还抛出了“写中间人物”论及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周扬特意洋洋地要他们写暴露我国所谓“阴暗面”的作品，他说这种小说“把矛盾都展开了，我看起来很有味道！”周扬及其黑帮所鼓吹的“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很明白的吗？

关于指导作家创作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针（一般叫创作方法，实际上这应该说是作家创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又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指导下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贯注着鼓舞人们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积极奋斗的理想，从而使广大读者受到教育，使文艺真正成为推进无产阶级事业的有力的武器。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新创造。每一个革命的作家都毫不动摇地贯彻这个写作方针。但是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者的周扬是怎样对待这个方针的呢？他在一九六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怎样体现？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的章程里都没有规定，随便你们好了，高兴体现就体现，不高兴体现就不体现。”这里，周扬及其一伙，竟然狂妄到这种地步，把他所操纵的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组织，置于党之上，置于毛泽东同志之上，公然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周扬为了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提供阵地，还主张开辟“文艺的自由市场”。他说：“我看可出内部刊物，还要‘五不’，随便写，可能出好作品呢。……这些内部刊物一是作品，二是争论问题，包括对党的政策的不同意的，报上不能公开发表的，文艺的自由市场。”十分明显，这种所谓“文艺的自由市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下刊物，是黑市。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必然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的冷枪暗箭。这种刊物就是中国的麦当劳俱乐部的反革命刊物。周扬所以想要办这样一个刊物，就是企图把那些拒绝思想改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聚集在他的黑旗之下，以便积蓄力量，磨拭武器，进行有组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六、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级政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发展无产阶级文艺学术和艺术学术思想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十多年来，周扬几乎逢会必谈“双百”，但几乎无一例外，每次都要把这个方针说成是没有条件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说：“应该是先百花齐放，所有民族传统的东西都发展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新的东西。”这就是说，不管作品的政治内容是否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可以自由地放。他指责说：“现在虽然没有有人公开主张‘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可是他实质上采取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从表面上看起来，他这个家伙。排斥所有的，只要是非社会主义的，他都排斥，他使社会主义文化很快地占领了阵地。表面上看起来很快，可是实际上效果却很慢。因为他排斥那些旧的东西，他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得不到营养；没有人跟他竞赛，他就不能从旧专家、老前辈那里吸收东西，就把自己弄得枯了”（着

重点为引者所加）。周扬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不是广大革命群众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是旧文化、旧专家、旧艺人，他公然主张在文化领域里实行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

周扬埋怨别人不推行他的所谓“双百”。他在一九六一年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说：“有的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修正主义的文章要检讨，犯了‘双百’就不检讨……也没有人让他去检讨。”这样，他既责备了没有人让检讨违犯“双百”的事，也用对比的方式，为了写修正主义文章而检讨了的人呼冤叫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扬心灵深处包藏着什么，很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

周扬这样热中于他的这种所谓“双百”，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一九六三年四月文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有一段表白：“意识形体的市场里，要估计到不但有现代艺术家的创作，还有古人留下的东西，精神食粮，包括一些我们的创造，一是古代的，一是外来的，十八、九世纪的东西，这些都在文化市场中流通。”原来，除了搞“黑市”以外，周扬还要在文化领域公开开放自由市场，要把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变成我们和“外国”、“死人”共存的“三三制”。

毛主席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制订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衡量香花、毒草的根据。党的领导，就是要扶植香花，铲除毒草，扶植新生事物，反对腐朽事物。而周扬却在不强调党的领导，不强调六条标准，大肆宣扬“在我们文艺园地里，开放的都是花”；并且提出一个奇怪的主张，说“艺术创作和艺术讨论的自由要保证，保证这些都是保证党的领导”。这就是说，让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自由泛滥，就是“保证党的领导”。这样，他就根本否定了在意识形领域中兴无贫的斗争和党对这一斗争的领导。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扬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政治上标榜自由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在文化上，周扬鼓吹自由化，实际上所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他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只准资产阶级放，不准无产阶级放，只准修正主义鸣，不准马克思主义鸣，只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准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有反毒的自由。这些年来，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李慧娘》、《谢瑶环》等等，周扬不仅给以鼓励和支持，有的并且是在他自己的策动和指挥下制造出来的。而对无产阶级左派批判这些毒草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却利用职权，一再扣压，不予发表。在这里，周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十分清楚的！

七、崇洋颂古，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扬多年来一直在宣扬一种“文化传统永恒”论，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革命学说。

我们先看一看周扬对于戏曲问题的主张吧。这个周扬，反对对戏剧为政策宣传，欢呼人们要接受创作封建意识的戏剧。他说：“刚解放，由于人们有一种‘革命情绪’，连《梁山伯与祝英台》、《贵妃醉酒》都接受不了。但过了一两年，就能接受了，这里面反映着时代的变化。所以关于艺术，我觉得应当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上看，应当考虑到满足人民美的需要与教育人民的两个方面。”周扬对于什么对于人们的的“革命情绪”加以讥讽，而对于人们能接受《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戏曲而感觉欣慰呢？因为他感到这些东西“美”。他说：“我感觉戏曲里面有一种永久的美丽，一种永恒的魅力，使人看了舒服愉快。有人问：戏曲会不会合乎我们的具体时代？现在我们的戏曲，就已合乎具体时代了。这一点，我们不要动摇。我们的戏曲，要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永久……。”正因为这样，周扬就不管什么内容，主张把旧戏曲都保留下来。他说：“有些老艺人的艺术满好，本来可以继续，因为强调内容，就把那个节目丢了，因此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宝库里边就损失掉一些好东西，这是很可惜的。总之，我们要想一切办法，使许多旧戏曲保留下来。”他甚至吹捧鬼戏，他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说：“如《活捉王魁》，王魁是一个陈世美型的人物，他考中状元做了官，就抛弃了原来的爱人。结果她死了以后变成鬼去活捉王魁。……变成鬼也要报仇，这表现了人民对旧制度的愤慨，过去认为戏里出鬼是宣扬迷信，其实出鬼的戏有很多是好的。”原来，鬼戏泛滥的根子，也在周扬这里。

周扬对于戏曲的这种态度，是和他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封建文化的主张相联系的。在他看来，“在封建社会里是封建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君臣父子之道等，尽管都是封建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的”。

周扬不仅用尽一切办法维护封建文化，而且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崇拜，也是五体投地的。他胡说：“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改造文学，后来这个任务就落在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他自称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吹捧“托尔斯泰和歌德这两个人是代表文化的高峰”。他主张“大量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人，他认为是不破不立的。他说：“搞戏剧有个很重要的‘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是一个很大的‘斯基’。有人说‘打倒斯基’，这是很不对的。这要学，人家有很重要的成就，是在世界戏剧史上唯一有体系的，根本不能打倒，也打不倒，为什么要打倒？”他要求：“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很显然，周扬是地主、资产阶级旧文化的忠实奴才！

为了推行他的这种主张，周扬疯狂地攻击我们对

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展开的批判和斗争。他手中经常挥舞着两根大棒，一根是所谓反对“反历史主义”或“公式主义”；另一根是反对“粗暴”。他大声疾呼，“不能一棍子打死打古人”，不要“大杀大砍”。为了保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文化，周扬还提出一个“破易立难”论。他说：“破比改容易，立就比较困难了。不是每一个破同时都等于立。”他攻击我们批判毒草，是“靠人多势众”来压人。真是一个阶级的人说着一个阶级的话，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反对文化大革命所用的话，周扬在过去就讲过了！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因此，我们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取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我们必须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批判地继承。对于外国进步的文化，我们也要批判地吸取，以为借鉴。然而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创造。而周扬却崇洋颂古，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明明是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吗！

八、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反对工农兵占领文艺阵地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项原则指示。这就是说，在文化上我们要坚决彻底地走群众路线，使工农兵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彻底打破资产阶级对文化的垄断。可是建国以来，周扬却一直在宣扬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完全不把广大群众放在眼里。一九五八年，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了一个文化高潮，而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周扬就出来给这个运动泼冷水。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什么叫作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就很难叫作文化高潮。”在周扬的心目中，只有那些所谓名家、名导演、名演员。正因此他有这种观点，他就在影界实际上提倡了明星主义。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他又在一九六二年七月长春话剧演员座谈会上说：“剧中在群众中的流传，必须有自己的艺术家。剧种的代表人物，象赵丹、金山等人，这有如一两个政党要有一个领袖一样，要有一个代表。”对于学校，他也是这样的看法。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教材工作会议上说：“学校好不好听的标准，要看有没有名教授，就象剧团好不好要看有没有名演员一样。”这样，他就把名人名家路线和单纯技术观点发展到极度，不要政治挂帅了，也不要红专结合了。他的理论是：“艺术好才能政治第一，艺术不好，怎么实现政治第一？象军队一样，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但队伍不好，不能打仗，怎么政治第一”。这样，他不但把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宣扬了白专道路。

由于醉心于“名人”和“专家”，周扬就采用高薪、高稿酬、高待遇这种“三高政策”，极力造就一些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这些人是碰不得的。如果触犯了他们，他们就勒令对之进行“精神退赔”和“物质退赔”。周扬还公开地包庇右派，为右派开脱，替右派翻案。他说：“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右派，在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可能是左派，所以我们既要批判他们，又要发表他们的文章，不要使我们感到垮台了，完了。”周扬就是这样积极推行“专家”路线，为右派分子打掩护，给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社会支柱的！

九、篡改历史，鼓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路线

多年以来，周扬一直在宣扬他的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攻击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攻击毛主席关于新文化的运动的论断。

早在一九四二年，周扬就提出要他把他的三十年代的文艺路线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他在《艺术教育改造问题》中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特别是在左翼十年中的革命文艺的历史传统，我们必须继承，离开它，我们便失去了立足点。”一九五八年他在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讲演中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和说明文艺现象，指导文艺运动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就成了无产阶级思想战线上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从我们打出无产阶级文学旗帜的三十年来，我们都是努力这样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总结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包括创作、理论和运动的经验，在总结经验、整理和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看出，周扬等人一直自诩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建立者，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硬把三十年代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说成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周扬这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带头鼓吹下，其麾下战将，群起响应。开会讲演，出书立传，摄制电影，进行自我吹嘘。一九六〇年三月，在周扬的指示下，由《文

学评论》和《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的集会；而《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国电影发展史》等著作，则都是吹捧三十年代的所谓“祖师爷”和“老手子”的。

周扬不仅积极鼓吹他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而且篡改历史，颠倒黑白。在一九五七年，他利用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等的批判，以后又利用《鲁迅全集》的出版，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污蔑鲁迅，诋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在周扬及其一伙的鼓吹下，许多大专院校的现代文学教师，都把“国防文学”这个错误的口号说成是正确的，而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的口号说成是错误的。周扬等人的这种狂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关于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去年九月已经发表了阮玲、阮若桐同志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和穆欣同志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两篇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十、宣扬“形象思维”论，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

为了把文艺领域划为不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管辖的独立王国，多年来，周扬一直在宣扬着所谓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扬形象思维论之后，周扬对形象思维论的鼓吹就更起劲了。在一九五九年全二届文工文艺汇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特别在一九六一年六月文艺工作会议上，他突出地强调了这个所谓形象思维论。他说：“如果我们讲文艺特殊规律的话，恐怕也是一个形象思维的问题。不注意形象思维，就要引导到概念化。”什么是形象思维呢，周扬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两种东西……搞理论概念化，搞概念的人，就容易搞逻辑思维；搞艺术的人就容易搞形象思维。”这就是说，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这样就规定那些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一些文艺家，提供了理论的武器。而周扬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个时期特别提倡形象思维论的。在一九六一年以后，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进攻了。形象思维论的提倡，对这种进攻起了鼓动作用。

周扬从外国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那里，搬运来一些所谓理论。他认为文艺这件事，只是“一个形象、一个情感”的问题，他说“这个情感”，“它比理论真实”。这就是说，情感是超越理性的。作家有了这种“情感”，就可以搞好创作。他反对对作家创作先有主题思想，他说：“不要一写先就搞一个主题思想，不要开始就想到了要写一个什么战略思想。”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在创作中不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理性认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周扬所提倡的形象思维论是一种排斥理性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理论，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这种所谓形象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他却蛮横地宣称：“形象思维，谁也推翻不了。”由于他是文艺领域的“最高权威”，所以这种反动理论，竟然流行在所有大学的新学教科书中，流行在广大的文艺界人士中，并列入新出版的《辞海》，被认为是真理。对于形象思维的详细批判，我已经发表了《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见《红旗》第五期）。这篇文章，就是反对周扬所提倡的形象思维论的。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直接点出周扬的名字。就这样，这篇文于一九六三年二月送到他们那里以后，还被他们扣押了两年又八个月。

＊ ＊ ＊

以上就是根据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归纳出来的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十大罪状”，这里他在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还末算在内。从此可以看出：周扬是钻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文艺界黑线的人物，是死心塌地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文化工作领域中的一个大恶霸。

事情是偶然的吗？不！周扬从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解放军报》的社论指出：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前期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期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列宁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思想。这就是对三十年代的周扬的历史总结。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扬顽固地坚持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为此，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批评。建国以来，他表面上表示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反对毛泽东思想，仍然坚持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我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不同的是，他又接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就更具有时代特色。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周扬是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文艺界，扶植亲信，排斥异己，造成了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局面。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参谋”和“战将”，而在各个地方文艺组织中，又安插着他们的一些“督军”和“镇守使”。这样，在全国文艺界，就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系统。周扬的这个主帅，便可登高呼号，八方响应，兴风作浪，为所欲为。今天，他在文艺上贯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殷鉴不远，对这种危险，我们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艺领域，粉粹以周扬为首的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是这场革命不容缓的一个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周扬这个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头号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刺掉他身上的画皮，彻底打垮这一伙黑帮，扫清他们所散布的毒雾，把我们的文艺工作真正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一九六五年的今天——八月六日,我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在东南沿海海面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敢于和善于在海上打近战、夜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了前来窜犯的蒋匪“剑门号”和“章江号”军舰。在这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中,涌现了无产阶级硬骨头战士麦贤得以及许多英雄模范人物。这里发表的,是参加这次海战的英雄们写的几个战斗故事。

毛主席给了我无穷力量

荣立一等功的轮机兵 伍振业

操纵杆猛压到底,飞速转动的主机又加快了速度,战艇猛往前冲,“呼”地一声向敌人扑去。

副艇长黄茂森弯腰钻进机舱里,把一张小纸条递到我面前,纸条上写着:“战斗就要打响,你们一定要保证机器正常运转,为人民立功!”

我顿时周身热血沸腾,连忙向班长要来一枝铅笔、一张记录纸,蹲在颠簸的机舱里写决心书:“保证完成任务。”字迹歪歪斜斜,但却是我的战斗誓言!我暗暗命令自己:哪怕天塌下来,也要保证战艇开得动,冲得上!

我拿着决心书准备送往指挥台,舱内突然火光一闪,战艇剧烈一震,呛鼻的硝烟到处弥漫。机舱

中弹!一个念头从脑子里闪过。决心书来不及送啦,亲爱的党,请在战斗中考验我吧。

请示已来不及,我飞身扑到排烟冒火处,赶紧先抢救主机。我一步窜到机器跟前,迅速打开紧急备用开关,引用海水冷却主机,解除主机爆炸的危险。紧接着,赶忙处理破裂的淡水管。情况紧急,我一只手握住裂口,另一只手找橡皮、铁丝。沸滚的水烫得我直咧嘴,不管它!我咬紧牙关把裂口捏得更紧。

班长发现这里情况紧急,冲过来想帮助我,我连忙向他摆手,要他继续照看其他几部机器,保证航速。我把橡皮、铁丝都摸到手上,飞快地把它缠到裂口上,淡水不再往外溢了。

随后,顾不得透口气,又转身跳到破口处堵漏。就着洞口,我忽然瞥见破口外边一条光闪闪的弹道,发出惨淡的白光绿光,划破长空,在艇旁激起一根根水柱。白光绿光是敌舰的炮弹,怎么专对准我们打?一定是破口漏光暴露艇队位置。想到这里,我迅速用手势报告班长灭灯航行。舱内顿时一片漆黑。

在黑暗中,我摸索着找堵漏器材,一手触着一个软包:一袋棉纱。好,就用它堵。

艇身在浪尖跳跃,怒涛冲击艇舷,海水压力聚集在破口这一点,我觉得手臂发麻腿发酸,渐渐支持不住了。这时,突然一个大浪扑来,艇身猛一颠簸,把我抛起老高,我手一松劲,还没堵严实的棉纱袋被冲开,海水又涌进舱里。

我费劲地在漆黑的舱内摸索棉纱袋,左摸右摸,终于发现棉纱袋夹在管路中间。棉纱浸了水,一提,好沉!加上长时间航行颠簸,体力消耗过多,下肢发软,双臂抽筋。我想招呼班长一齐来堵,可现在正在接敌,主机离不开人,我一咬牙,一个人继续再干!

在这黑得伸手不见五

——编者

指的机舱里,听着机器高亢的声音,我默诵着出航前我们写在机舱小黑板上的那段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顿时,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身影就站在在我面前,含笑的眼睛亲切地望着我,好象是我不能象他老人家教导的那样去做。

我浑身一热,立刻感到力量倍增。我一抡胳膊,猛地抱起沉重的棉纱袋,和着身体一齐压到破口上,并趁势顶上木支柱。这一回海水休想钻进来了。我禁不住对自己说:

“毛主席啊,是您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班长迅速用主机排除舱底积水,其他破损也都及时修复了。

艇队保持着严整的队形,直冲到敌人跟前才开火。我们艇没有因为机舱的破损而拉下一步。

把胜利的消息发出去

荣立一等功的艇长 许永江 易松如

敌“章江号”已被击沉,指挥所命令我艇队加入战斗,高速迫近逃敌“剑门号”。战艇轰鸣隆隆浪飞,艇身大幅度摇摆,艇上的电讯手石锁才正在聚精会神地抄收电报。他又一次把滑落的耳机扶正戴紧,滴达的电报讯号声在震耳的机器怒吼声中忽隐忽现。但是,任何微弱的话报,都躲不过他那敏锐的耳朵。只能坐不能站的小小报房,深深地埋进机舱里,室内温度高达四十度,石锁才象坐在蒸笼里一样,身上的汗水顺着透了衣服直往坐垫上流。他甚至都不敢动一下脑袋,生怕脸上的汗水象雨点似的洒到报纸上。石锁才用惯常的工整的字迹,飞快地抄下指挥所的一份份报文,又用清晰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驾驶台上编队指挥员的耳里。

忽然,耳机里“咔”地一响,讯号声消失了。石锁才迅速扳扳收讯机上这个旋钮,没有声音;扳扳那个旋钮,还是没有声音。他摘下耳机来检查,没坏;摸一摸导线,是不久前新换的,没问题。他想到我们艇是指挥艇,与指挥所电讯联络中断,这影响该有多大!心里一阵

焦急。“要不要报告指挥员?不,不要去扰乱指挥员的指挥,越是关系重大,越是要沉着应付,一定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又想:会不会是战艇高速航行,收讯机内部有机件给震坏了,以致接触不良?他试着把收讯机朝机匣用力往右一推,耳机还是没有声音;又往左使劲一拉,滴滴达达的电码声出现了,是上级预告:下面有重要报文!当他把手一松,电码声又消失了。

在这争分夺秒的时刻,拆开机器检修已经不可能,石锁才果断地用左手把机件往左紧紧扣住,右手抄报,就这样,一份通报敌艇逃窜方位、指示艇队追击航向的重要报文,一字不漏地在报纸上出现了。

艇队距离敌人愈来愈近,指挥所的来电也更紧密、更重要了,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歇。石锁才右手不停地抄报,左手

逼近轰击“剑门号”

荣立二等功的水手长 閔培林

没有得到解放的人民,思想上要有世界革命!”眼下,正是他和英雄艇队实践庄严誓言的时候了。

“距敌×艇!”雷达手报告。艇队继续向兄弟艇队攻击敌舰的火网下疾速冲击。许永江艇长命令各战位瞄准敌舰。他耳旁响起了张副大队长低沉的但是清晰的声音:“沉着,把稳舵向,再近一点!”

敌舰拦截炮火远远落到艇队后面去了。东方已经发白,曙光把“剑门号”庞大的轮廓衬得愈来愈清楚,敌舰舰面上漫卷着浓烟火舌……

“距敌×艇!”雷达手继续报告。许永江的心头升起和敌人面对肉搏的愿望。他想象我们的炮弹将要象一把把明晃晃、亮色曳光弹,敌白色曳光弹,我们从弹道中间穿进去!”

许永江艇长理解首长的意图,是要最大限度靠上去打,“加速!”他命令轮机长。其实,他早就给轮机长下了好几次加速的命令了,轮机长也早就把作钟操纵杆推到最高速度。战艇高昂起艇首,山一样的浪翼飞落到后面去,敌人炮火炸起的水柱也被远远抛到了后面,艇体猛烈颠簸,把左右抱拥着。可是许永江艇长还感到速度不够快,他的心被沸腾的阶级仇恨的波涛充满了。许永江七岁的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他父母的生命。还没有牛肚子高的许永江就给他主放牛,当小长工,他身上至今还留着地主毒打的鞭痕。解放了,党把他培养成驾驶战艇的人民战士,他怎能不带着满腔阶级仇恨上战场呢!长期以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真理,使他牢牢树立了“永远是战斗中的”战备观念。他把毛主席的教导铭刻在心里,时常对战士们说:“我们要打在蒋匪身上,痛在美帝心上!我们眼睛要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

闪闪的刺刀,一下都戳入敌人的心窝!”是不是再近一点?”他请示张副大队长。从张副大队长坚毅的目光里,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懂得编队首长在鼓励他:“要猛,要狠,要准!”指挥艇率领编队雷鸣闪电般向敌舰跟前冲去……

“距敌×艇!”雷达手报告。距离是这样近,“剑门号”高高的舷墙,象一堆黑糊糊的破烂照壁拦在战艇艇首,连敌舰轮机哮喘病一样的低喘和匪兵哭哭嚎嚎的惊叫,都听得见。

决战的时刻到了!张副大队长和许艇长的目光迅速交互一闪,沉静地对着话筒命令:“射击!”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我艇队

滚雷一般的炮火,怎样猛烈在敌舰上“会师”,只听得天崩地裂的几声巨响,汹涌的波涛顷刻间吞没了“剑门号”。



坚守在信号战位上

荣立三等功的雷达兵 葛德富

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萤光屏上,敌“章江号”这个黑点终于被我们彻底“抹掉”了。我正想大声欢呼胜利,话筒里传来指挥员的声音:“立刻上指挥台接替信号员的工作。”我心里一沉:莫非信号员许文华发生了意外?

我急忙跨出雷达室,摸到话机跟前,许文华戴着耳机,紧握着话筒,正在跟上级联络。我招呼他,他没回答,大概工作正忙。

我第二次跨上信号战位,知道他左臂负伤并已包扎,忙伸手夺过话筒,耳机说:“你呀,负了伤也不吭一声。坐在这儿干什么。快找个没有风、海水打不到的地方休息去!”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用腿碰碰我,声音轻微而急切地说:“老伙计,你还是回原战位吧,我能……”

“你能什么?你看,前面那黑呼呼的家伙,就是我们追歼的‘剑门号’。战斗快要打响,这时候通讯联络多要紧!怕他躺着不走,我又特别加重语气:“我接替你的工作,是上级的命令!”

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把岗位让给我,但坚决不肯去休息。我把他扶到一边,对他说:“你不下去也

行,就老老实实坐在这儿休息吧。”

东方透出一线曙光,天空变成灰蒙蒙的。我艇紧跟“海上先锋艇”疾速接敌。敌舰慌忙地打着炮,梦想阻拦我们。这时候,耳机里传来编队指挥员的命令:

“各艇要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组织好火力,准备再战!还是近战,刺刀见红,逼近了再打!”我迅速将命令传达给艇首长以后,正要向指挥艇回话,话筒冷不防被许文华夺了回去,只见他嘴对话筒大声回答:

“我是二号,二号明白!”接着,右手举着话筒,垂着左臂,熟练而迅速地传达命令、报告情况,声音坚定宏亮,一点不象个伤员的样子。

我劝说他,夸他的话筒,都被他推开。他精神抖擞,一字一顿地说:“我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说完,反倒催我:“你回本战位去,要不,上别的战位参加战斗去吧!”我没办法,在上级同意下,只好在一旁协助他工作,顺便照顾他。

敌舰炮火更加密集,舷旁炸

起一根根水柱。我们艇继续高速冲击,指挥台上空气严肃紧张,人屏声静息,等待编队首长的射击命令。许文华更是全神贯注,细心捕捉耳机里的每一个音阶。突然,许文华使出全身力气,大喊一声:“射击!”

随着他的喊声,刹那间天摇地动,全艇火炮一齐轰鸣,炮口闪光,火龙飞舞,一下子就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了。

战斗开始,通讯联络更加频繁紧张,炮弹呼啸,机器轰鸣,浪涛轰鸣,给报话机增添强烈的干扰。可是这一切都不倒许文华,他端坐在报话机前,那两只负伤的右手紧握话筒,坚定有力的声音,把上级的战斗命令、指挥艇的坚定意志和开放决心,清楚宏亮,一字不漏地传到我们艇上。

我们艇和其他艇在编队首长的指挥下,捏成一只钢铁的拳头,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不到几个回合,就把这刚从美国出笼的“巨嘴鸟”打得千疮百孔,碎片横飞,一眨眼沉入海底,跟“章江号”倖伴去了。

我们沐浴着朝阳,排着整齐的队形返航。这时候,许文华站起身,放眼看着辽阔的海空,活动了一下右臂,又望望左边的左臂,自嘲地说:“这次战斗,可让它休息了个痛快!”我也笑呵呵地说:“下回打仗,再让它多干点。”



本版插图: 吴敬 李宝林